

凭窗读史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。在神武门展厅一层,展出了一件特别的文物——旧木箱,上面划痕密布,叠压封条,一把老锁锈迹斑斑,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慷慨悲壮岁月:

1933年山海关沦陷后,为防日寇劫毁,故宫博物院1.3万余箱文物精品,从北平迁往上海、南京,后在纷飞战火中,分三路南渡西迁十余省。抗战胜利后,又经历了东归、迁台和北返,历时二十多载,辗转数万里,颠沛流离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、行程最长、历时最久的“国宝长征”,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。

奇迹背后,是故宫守宝人在破碎山河中的不离不弃,是逃难同胞为国宝让路的深明大义,是国际友人在大轰炸中的凛然守护……

“文化一亡,永无补救”

1933年2月5日,夜幕低垂,故宫博物院大门打开。一大批人力车夫拉着排子车,匆匆进入神武门。

太和门前广场上,摆满了贴着封条的大木箱。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身披斗篷,现场坐镇指挥,一件件木箱被有序运出太和门,经过午门,直奔北平西站。

沿途全戒严,两旁军警持枪而立。火车站里,两列全副武装的火车,正静静等待这些木箱抵达。100名东北宪兵在车外守护,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。这些木箱里装的,是故宫精挑细选的文物,是举世无双的国宝。它们,要与日寇的炮火“赛跑”。

早在1931年,九一八事变后,易培基就开始酝酿故宫文物南迁一事。

易培基是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。1924年,他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,与同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煜瀛一起,策动冯玉祥驱溥仪出宫。故宫收归国有后,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,易培基是其核心成员。1928年北伐成功后,易培基被委任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。

清室善后委员会曾于1924年召集上千人,用了5年多时间,第一次摸清了故宫的家底——117万余件文物。其中,像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、宋徽宗《听琴图》等,很多都是绝世珍品,是中华民族千年文脉的见证。

易培基深知,日本人侵占了中国东北,狼子野心绝不满足。平津一带难免发生战火,故宫文物在劫难逃,必须早做准备,必要时撤离北平。“国亡,尚有复国之日,文化一亡,则永无补救。”

故宫文物南迁,牵扯各方利益。易培基不敢声张,秘密安排员工挑选重要文物整理装箱,并反复叮嘱:不要声张,如果有人问起,就说是为了整理库房。但故宫人员庞杂,消息还是不小心泄露了。

一时间,舆论四起。

许多北平市民不赞成南迁。东北沦陷,华北人心动荡,运走这么一大批文物,岂不是向老百姓宣告:国民政府即将放弃北平,放弃华北?不要国土,不要人民,还成什么国家?北平街头打出横幅:“文物南迁就是逃跑!”“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!”

学界名流也纷纷站出来反对。胡适认为,在国际人士的监视下,未必有人敢破坏文化古物。况且,故宫文物数量巨大,迁移并非易事,万一发生意外谁负责?徐志摩给国民政府呈文,请求故宫文物“无论巨细,概不出故宫之门”。“鲁迅则写打油诗讽刺当局:“文化一去不复返,古城千载冷清清。”

最激烈的反对者,莫过于各界陈列所所长周肇祥。他联合全国成立了“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”,自任主席,不断派人给支持南迁的工作人员打骚扰电话:“当你的命!”并扬言一旦文物起运,就在火车站、铁路沿线放炸弹。

作为易培基在湖北学堂的同窗好友,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劝易培基,不要操之过急,“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,问题非常多,责任既重,闲话也多,内外的敌人,都等待着,我们最好不做此事!”易培基反驳道:“大敌当前,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,推卸责任!”

一片争议声中,1932年,中央政务会议讨论处理故宫文物办法,其决议之一竟然是: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,购飞机500架,以充国家抗战之资。

易培基得到消息后,“不胜骇异”,连忙给坐镇北平、节制北方八省的张学良拍电报:“故宫所藏关系全国文化,中外观瞻所系,乞公设法劝阻,始终保全。”

当时,张学良背上了“不抵抗将

军”的骂名,出面劝阻,很可能会背上新的骂名。但作为故宫博物院理事,张学良支持文物南迁。他及时出面斡旋,终止了这项荒唐的决议。据说,后来张学良与易培基在碧云寺旁的一所小别墅里,谈了一整天,敲定了文物转移的具体方案。

1933年年初,日军仅用3天时间就占领了山海关。长城脚下的北平,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。

危急关头,南京行政院正式批准了“国宝南迁”的决定,密电故宫博物院:“先行选择最要部分,分别由平浦等路逐行运至沪。”财政部紧急拨款6万元作为文物迁移费用,以应急需。

“北平安静,原物仍运还”

故宫文物数量巨大,装箱、搬迁都是大工程。

当时,故宫有古物、图书、文献三馆。各馆自行装箱,其他散在各宫殿不为三馆提管的,由秘书处装箱。文物装箱难易不同。据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科长的庄尚严回忆,最容易装的是图书,其次是图册档案,最难装的是古物。“如瓷器,有的其薄如纸,有的其大如缸,又如铜器,看其形状似乎坚强,可是一碰就碎。”

故宫工作人员,很多都像庄尚严一样,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学生,“没有一个人对装箱稍有经验”。他们只得师法前人——打开库房,找几个乾隆以来,由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的装瓷器的箱子,打开来看看是怎么包装的。接着又去琉璃厂各大古玩商店,打听他们如何把古玩装箱出口,并请老师傅们上门演示。

装箱日久,庄尚严和故宫同人逐渐掌握了其中要领。比如装瓷碗,碗与碗之间用棉花隔开,再用厚棉花把两三个碗裹一起,外面用纸包好、用绳扎牢,包外写明文物号数、件数。装箱前,里面先垫一层稻草、棉花,再把包好的瓷碗一层层铺好,用棉花、稻草紧紧塞满所有空隙,最后把盖子盖好钉牢,使箱子成为一个整体,里面包都都不活动。这样用心的打包,是故宫文物在历经万难、跋山涉水后,依旧安然无恙的关键。

起初,故宫为了省钱,用的是装过纸烟的旧木箱。木板很薄,手扶上去晃悠悠。棉花也是回笼的“黑心棉”,味道极难闻。装箱的员工们有意见:这样弱不禁风的箱子装文物,路上万一有闪失,谁来担责?

于是,故宫把“黑心棉”换成新棉花,专门定制了一大批长1米、高、宽各0.5米的新木箱。一车一车空木箱、棉花,声势浩大地往神武门里拉。整个故宫叮当作响,一片繁忙。据当时在故宫古物馆任职的那志良回忆,“刚刚装箱的时候,大家并没有十分紧张,以后时局愈来愈坏,大家才赶装起来。”

历时近一年,故宫总共打包了13427箱64包文物,包括散氏盘、嘉量等青铜重器,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宋徽宗《听琴图》等书画名品,以及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珍贵古籍。

山海关失陷后,文物南迁已是箭在弦上。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紧急决议:首批文物2118箱于1933年1月31日起运。行政院通过了这项决议。

当天,箱件都已捆扎停当,等待起运。不料,周肇祥竟然作妖,带着群众



1935年,故宫文物南迁期间,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全体同人。前排右四为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。

在太和门前高喊“誓与国宝共存亡”,并煽动拉运工人罢工。闹了一天,结果一件箱子也没能运出故宫。

易培基又气又急,赶紧给故宫博物院理事、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。但由于马衡主持古物馆的古物装箱,无法脱身,只好换人。

易培基想来想去想到吴瀛,几次亲自上门说服。吴瀛虽然不大支持文物南迁,但念及多年同窗情谊,最终慨然应允。1933年2月5日,他率领几名故宫同人随首批南迁文物从北平出发。

据说,当时日本关东军已派特务侦察情况,准备在文物南迁途中用飞机轰炸。好在故宫早有预防,运送路线没有从北平直奔上海,而是舍近求远,绕道郑州,再走徐州,最后前往上海。沿途经过的地方政府都有军警分段护送,日军的轰炸计划最终落空。

路经徐州一带时,遇上土匪劫车,1000多人在铁路附近埋伏。幸亏地方军队及时发现,和土匪打了一仗。“匪众知道泄露劫宝行为,而且官方有备,所以退去。我们自然格外兢兢。”吴瀛在《故宫尘梦录》里回忆道。

2月10日,火车缓缓驶入南京下关车站。这时,吴瀛突然接到一个消息——第一批文物,不去上海了。原来,就在前一天,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、国民党元老张继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紧急提案,建议将



国宝南迁

——抗日烽火中故宫文物迁徙之路(上)

故宫文物改运洛阳与西安。他的理由是:“古物运往上海,存入租界,受外国人庇护,是国耻。”

故宫文物迁沪原是宋子文的主意,而这次中政会议,宋子文恰好不在南京。张继的理由冠冕堂皇,与会人员又无法反对,议案就这样通过了。

时任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来南京车站接车时,通知吴瀛:列车暂时停靠在站上,先不要卸车。行政院已经打电报到洛阳、西安,如果回电说有地方存储,立刻转运过去。

吴瀛哭笑不得,但又毫无办法。他从军政部借了大批油布,盖在火车顶篷上,同时借调了500名官兵,加强防守。2118箱国宝就这样装在火车里,停在铁轨上,原地待命。那志良形容当时是“抬着棺材找坟地”。

等了将近一个月,宋子文回到南京,国民政府才最终决定:古物、图书照旧运沪,文献则暂留南京。

3月5日,1054箱古物、图书抵达上海外滩金利源码头,存入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库房里。其余1064箱文献档案,则运存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大礼堂。

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,又有四批文物先后运到上海。除了故宫自己的文物,还有古物陈列所、国子监和颐和园的一些文物,加起来一共有19621箱72包零8件。

就在文物迁到上海不久,故宫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有人控告易培基非法侵占、盗卖故宫文物,南京最高法院对易培基进行审查。易培基为自证清白,向理事会提出辞职。他在北平、上海、南京的房产被查封,财产也被没收,不得已逃到上海避难,于1937年在上海郁郁而终,年仅57岁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这起“故宫盗宝案”被证实是一桩“凭空捏造”的冤案,但在当时却把故宫推向了风口浪尖。

上海气候潮湿、人员复杂,文物迁到这里是权宜之计。1936年,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,在南京筹建分院及永久性库房。教育部把金陵名胜朝天宫,接给了故宫博物院。1937年1月1日,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,在上海存放了四年的故宫文物被全部运到那里。

马衡是北京大学教授、国学家考古研究室主任,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清点故宫文物的工作。他不仅是故宫博物院草创时期的元老,而且是有名的金石学家,有很高的社会声望,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,可以说是众望所归。然而,马衡却再三婉拒。

马衡之孙马思猛在《金石梦 故宫



故宫神武门展厅展出的文物南迁时期的旧木箱。

情》一书中道出个中原委:“爷爷深知当时故宫博物院内人事关系复杂,且前院长易培基又陷入所谓‘侵占故宫古物案’,该案尚未了结。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一向是为世人关注,并为一些人所觊觎的职务。”

最后,身为理事会理事的蒋介石发话:“既然大家一致推举,我看马先生就不必过谦了吧。”无奈之下,马衡向理事会提出三个条件:就任院长只理院务,不问“易案”,对故宫文物进行重新点查造册;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任职;对故宫博物院进行全面改组,院长对院内人事安排有处置权。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一一通过照准,马衡这才于1934年4月正式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。

马衡上任时,文物南迁已告一段落,对迁沪文物进行点收成了头等大事。故宫文物从北平起运时,由于事起仓促、时间紧迫,账册记载相对简单。这次点收规定,每件文物的质地、色彩、尺寸、款式都必须写在文物单上,一式两份。一份装箱时封在箱子里,一份装订成册,汇集为《存沪文物点收清册》。这份册子成为故宫南迁文物最完整的账册。

清点文物时,需要给每件文物编号。清室善后委员会曾按《千字文》顺序,即“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”为文物编号。马衡一改前例,把故宫1.3万余件木箱分为四大部门,编成四个代表的简字。古物馆箱用“沪”字,图书馆箱用“上”字,文献馆箱用“虞”字,秘书处箱用“公”字,连在一起,所有文物便成了——沪上寓公。

“寓公”在古代指失掉领地而寄居他国的贵族。把迁沪文物比作“寓公”,在庄尚严看来,是马衡“对这些无价国宝啗了一默,而事实确实如此。”

上海气候潮湿、人员复杂,文物迁到这里是权宜之计。1936年,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,在南京筹建分院及永久性库房。教育部把金陵名胜朝天宫,接给了故宫博物院。1937年1月1日,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,在上海存放了四年的故宫文物被全部运到那里。

国宝的漂泊之旅眼看就要结束,然而,仅仅七个月之后,日寇的铁蹄就逼近了这座六朝古都。

张小英



1930年代,国营招商局金利源码头,故宫南迁文物箱件从这里上岸。

1933年1月,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在延禧宫库房前搬运文物。